

重读《囚徒歌》的回想

金 丁

“谁能估量我们在这段长期监狱生活中所具有的忍受苦难的能力和耐心呢？谁能估量这样悲惨的命运呢？我们之所以能对付这样的命运，就是因为我们能不让命运把我们驱赶到容忍的极限，不使我们堕入各种各样的失望中，而在胡作非为的种种暴行下，我们依然是顽强坚定和不可制服的。”

——恩斯特·台尔曼

没想到徐迈进同志收到我信的当天晚上，就把他五十三年前（一九二九年）谱写的《囚徒歌》抄给我了。词曲如下：

囚 徒 歌

1=G 2/4

兼三词曲（徐迈进，字兼三）

庄严·稍慢

: 5	1·	7 2 2	1·6	5	—	3	3·	5·6	5 4	
囚	徒，	时	代	的	囚	徒。	我	们	并	不
3	—	6	6·	5·4	3 1 1	2·3	2	2	1·	
罪，	我	们	都	从	火	线	上	俘	来，	从
										那

这支歌我已记不清唱过多少遍了。为什么到了迟暮之年，居然又热衷于青年时喜唱的歌曲？是因为自己生活中曾经有过的痛苦经历，今天仍会在精神上给人以更多的支持吗？

我看着写字桌玻璃板下的两张照片，是今年我那出生在东北的小孙子在苏州照的。他路过北京时，听祖母说，我曾在苏州住过四年之久，非常羡慕。因为他只在苏州逛了两天，就觉得很高兴了。他还不到能理解我在苏州坐牢那种遭遇的年岁。其实，现在有些年龄稍大，譬如说三四十岁的人吧，是不是对牢狱生活也仅限于道听途说而已呢？

除了住过三所监狱，苏州的一切风景名胜，几乎都与我无缘。出狱的时候，我的家乡已是敌骑纵横，所谓“荆榛障道家犹运，烽火连云国半漂”（见《少石遗诗》^①），什么岩花野草，都已无心看了。待到解放以后，我虽几次经过苏州，但也只是“路过”，并未在那里停留过，这或者是件憾事。但这三所监狱，现在想来，确不失为在青年时的“我的大学”。

我被关在苏州的第一所监狱，是座落在司前街的第三分监。这里关有政治犯和普通犯，多数是不曾判决或虽判决但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所谓“官司未定”，是属于拘留的性质，所以三分监也叫看守所。

第三分监只有一个弄堂（记得叫二弄）关的完全是政治犯，弄里有大小不一的八个号子（牢房）。我最初被关在最大的一个号子里，大约是十四五平方米吧。靠着四壁是靠墙固定的二尺多宽的床板，床板边缘离地一尺多高，也钉着落地的木板。因此，床既不

^① 少石，即李少石，是我的同族朋友。

受艾芜的启示，我感到在上海公安局身受、目睹和耳闻的特务们的法西斯暴行，有尽快揭露的必要。于是用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我写完题为《两种人》的短篇。我恍然觉得像在监狱里，

大部是写信、买邮票和信封信纸的地方，也能买到纸烟。有钱的刑事犯，早晨可以买到油条、大饼。但对一般政治犯说来，大家吃的黄米饭确实难以下咽，沙子、稗子极多，而且不足定量的三分之二。

因为每人的案情不同，有的毫无人证物证，外面如能有人设法营救，免于起诉或判决无罪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在政治犯里，对监狱当局的态度，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我到三分监的第二天早晨，就听到对门号子里有人领头唱起了《国际歌》，可是旁的号子里并没有什么动静。不过有时居然是几个号子同时唱起来了，看守无法制止。什么原因会使大家一齐唱起来呢？

我还没有在监狱里斗争的经验，不过直觉地感到，唱歌总给人以精神上的振奋和快慰。监狱的生活，是单调、沉闷和孤寂的，整天就是或坐或卧，牢房里没有活动的余地。如何突破情绪上因环境的狭窄而造成的无奈呢？我以为唱歌是个好办法。一唱歌，就仿佛自己的思想感情立刻同外面广阔的世界沟通起来。我爱唱外面不能随意唱的歌曲。我学会了唱《国际歌》。我特别喜欢《少年先锋队》歌。是啊，“走上前去呀，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那种明快而激越的调子，不是唱起来就象什么困难、危险都无所谓了吗？

